集体记忆与学校认同的建构：
以圣公会中学的筹款活动为例 =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s collective memory : construction of
school identity in Anglican High School

曲景毅 Qu, Jingyi

2018

Qu, J. (2018). 集体记忆与学校认同的建构：以圣公会中学的筹款活动为例 =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s collective memory : construction of school identity in Anglican High School. 华人研究国际学报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10(2), 81-96.
doi:10.1142/S1793724818000172

<https://hdl.handle.net/10356/143509>

<https://doi.org/10.1142/S1793724818000172>

Electronic version of an article published a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asporic Chinese Studies, 10, 2, 2018, 81-96 <https://doi.org/10.1142/S1793724818000172> @ copyright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net/ijdc>

Downloaded on 26 Apr 2023 19:49:36 SGT

集体记忆与学校认同的建构：以圣公会中学的筹款活动为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曲景毅

摘要：集体记忆是一群人的共同过去，有助于塑造集体身份的认同。圣公会中学由新加坡圣公会教会中文会众于 1955 年资助成立，目前是新加坡政府的特选学校。常年的筹款活动是让圣中师生、校友上下一心的典范性活动，这种认同和归属在重复与坚持中形塑与传承，从而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留存于一代代圣中人心目中，形成对圣中的身份认同。本文以圣中四位校友的口述历史访问及校方出版的文献资料为据，着力探讨圣中：1) 创校至 1970 年代的建设体育馆的筹款活动；2) 1980 至 1990 年代的义卖会与文娱表演；以及 3) 新世纪至今的慈善益走与嘉年华的结合。通过以上三个历史时期的筹款活动的论述，证明常年的筹款活动对学校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集体记忆；圣公会中学；筹款活动；学校认同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s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School Identity in Anglican High School

Abstract: Established in 1955, Anglican High School (AHS) was founded with partial funding by the Chinese-speaking congregations of the Anglican Mission in Singapore. AHS is now one of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AP) schools by Singapore gover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AHS has continuously, since its founding years, organised fund-raising activities, and how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it has become a prime example of how teaching staff, students, parents and alumni, can be brought together, and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HS' identity. Such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need to be repeatedly and continuously shaped and passed down, so as to become a collective memory belonging to all generations of Anglicans. Based on four alumni's oral interviews and second literature sources, such fund-raising events would be divided by time periods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stadium through students' fund-raising from the school's founding to the 1970s; 2) fund-raising events including bazaars and arts performances in the 1980s to the 1990s; and 3) fund-raising events including AHS school walk and carnivals from the 2000s onwards.

Keywords: Collective Memory; Anglican High School; Fundraising Activities; School Identity

任何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都会对母校有所回忆，美好的回忆可以使校友毕业后回馈母校，捐钱资助学校的建设；伤心的回忆可能导致校友劝告他人不要上这所学校。所以记忆会影响行动，集体记忆的影响更大，它可以产生归属感与向心力，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成学校身份认同的形成。这很好地体现在圣公会中学自 1955 年建校至今的 64 年历史中。因此，圣公会中学是研究集体记忆如何建构学校认同的绝佳案例。本文着重探讨圣公会中学三个历史时期的筹款活动及其对学校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

1. “圣中”的前世今生

十九、二十世纪，中国的移民大潮给新加坡带来了大量的华人移民，其中多数为商人、苦力，比较有能力者则携带家人一起飘洋过海。他们之中有人落叶归根，也有人落地生根，那些在新加坡安家落户的人，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便是子女教育。当时的新加坡，学校稀缺，随着移民的不断涌现，新加坡华社纷纷建立了学校，大多以汉语方言或中文授课，故习惯称之为“华校”。华校大多成立于 20 世纪初至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前夕。然而，这些华校在 1979 年随着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而面临严峻的考验，一些被教育部接管而成为以英文授课的公立学校，另一些则被迫关闭。其中比较幸运的则成为特选学校（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 SAP）。特选学校制度让校方有弹性地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华文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机会，并承担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的使命。特选中学制度实施初期仅有 9 所中学（后扩展为 11 所），圣公会中学（简称“圣中”）便是其中一所。¹ 圣公会中学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表现均相当突出：篮球队连年夺得全国冠军，圣公会中学是全新加坡第一所开办体育班的学校；该校的文艺团体获得多项全国奖项，其中合唱团和铜乐队的表现最为优秀。此外，该校的校友会也相当活跃，许多会员在母校任职，为本研究提供大量珍贵的资料。

圣公会中学由新加坡圣公会教会中文会众资助成立，故以此教派命名²，它是新加坡圣公会教会学校中唯一一所华校。有趣的是，《海峡时报》在 1958 与 1959 两年多次以 Anglican Chinese High School 和 Anglican High School 称呼“圣中”，但资料中无从得知前者是否是编者为了凸显圣中的华校身份而加入“Chinese”这个字眼。³ 然而，校方出版的刊物均使用“圣公会中学”，校方书写的简史记载在 1955 年 11 月 15 日的校务会议上定校名为 Anglican High School。⁴

圣中在 1956 年成立时并无校舍，需要借用圣公会教派管理的圣安德鲁中学的校舍上课。⁵ 校方本打算在圣安德鲁中学的伍兹维尔校园建立新校舍，但由于圣安德鲁中

¹ 特选学校，又称特别辅助计划，是新加坡政府自 1979 年为学术成绩优异，并精通华文及英语的学生设立的中学教育课程，让学生除了英文之外有效使用华文作为母语的第一语文。目前有 11 所中学，15 所小学（其中 3 所为中学附小）是特选学校。参见 Cheryl Sim,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 Singapore Infopedia, July 21, 2016, accessed on March 13, 2018,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6-07-21_154021.html.

² 圣公会中学编，《圣公会中学简史》，见《圣公会中学建校特刊》（新加坡：圣公会中学，1960），页 34；“New School Planned by Anglican Church”,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5, 1958, p. 8.

³ “New School Planned by Anglican Church”,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5, 1958, p. 8; and “Choir Puts on ‘Messiah’”, *The Straits Times*, May 18, 1959, p. 4.

⁴ Anglican High School, *The Soaring Eagle: A History of Anglican High School 1956-2005* (Singapore: Anglican High School, 2005), p. 21.

⁵ “Big, Happy School, Says Archdeaco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October 1, 1956, p. 3.

学也面临教室吃紧的窘境而无法让圣中在此建校。⁶ 有鉴于此，校方在 1958 年 8 月计划在圣玛格丽特小学旁建立现校舍，但由于各种因素而作罢。最终，校方觅得离樟宜路 8½ 英里的一块地作为永久校址并延用至今。⁷ 建校初期所寻觅的新校址均临近圣公会教会旗下的学校，或许是为了成立圣公会校区，为信众的子女提供小学至高中教育。最终选定的校址虽远离其他圣公会学校，但四周空旷的地理环境为日后的校园发展提供了便利。

2. 研究方法与理论依据

2.1 文献梳理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一群人的共同过去，有助于塑造集体的身份认同。⁸ 记忆不是对于曾发生的事件或历史的反刍，它是从主观的角度重建过去，因此经常与事实有所出入。

Adam Brown、Nicole Kouri 和 William Hirst 在他们的文章《记忆的延展性：在塑造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中的作用》中，指出自传体记忆可能同时被重建为跟他人不同的记忆，又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产生共同性。通过这种融合，形成集体记忆，这反过来又促进了集体认同与社会属性。⁹

匈牙利哲学家 Agnes Heller 提出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体现在储存意义的客体中，这些意义被一些人视为理所当然”。这些客体可以是有形也可以是无形，包括文字、纪念碑和反复进行的活动。后者对本文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它可以指节日、节庆和仪式，而这些都可以构成文化记忆，尤其一些有象征性的活动还在不断重复进行。¹⁰ 有象征性的活动的不断重复进行对于文化记忆的形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⁶ Mission Plans to Build \$500,000 Chinese School”,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15, 1956, p. 7; “New School Planned by Anglican Church”, p. 8.

⁷ “New School Planned by Anglican Church”, p. 8; “Stone-laying”,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14, 1959, p. 9.

⁸ Maurice Halbwachs,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 J. Ditter and V. Y. Dit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⁹ Adam D. Brown, Nicole Kouri, and William Hirst, “Memory’s Malleability: Its Role in Shap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Ident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3 (July 2012), p. 257, accessed March 14, 2018, doi:10.3389/fpsyg.2012.00257.

¹⁰ Agnes Heller, “Cultural Memory, Identity and Civil Socie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ociety*, no. 2 (2001): 139-43.

图一：身份认同的构成

德国学者 Jan Assmann 勾勒出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文化记忆是“使我们能建构过去的能力，并通过这个过程建构自己的身份和形象”。身份认同由实体部分、组织活动和符号意义组成，见图一。将此理论应用在学校上，实体可以指校园建筑、固定校服，这些可以清楚界定一个学生的身份；符号可以指重要的图像，例如象征学校的校徽；而活动则是个人参加的所有活动，例如学校的朝会。这三个环节互相联系却并不单独存在，比如学生在朝会上看到桅杆上悬挂着校旗，这就是符号和活动的连接。因此，文化记忆是官方认可的事件，每个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以肯定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Jan Assmann 总结为“如果你想成为某个群体的一份子，你必须遵循这个群体对于记忆的规则。”换句话说，文化记忆是一种凝聚力量，它有助于构成一种身份认同，并将人们聚集起来。这虽然对构成学校的精神有益，但一些集权政府却持相反意见。Jan Assmann 还指出：“集权政府要摧毁过去，因为控制现在就是控制过去，若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¹¹这样的观点同样值得深思。

美国著名学者 Benedict Anderson 在其《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提出 20 世纪的独立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一个民族，即使是最小的国家的成员也永远不会了解他们的大部分成员，遇见他们或者听到他们的话，但在每个人的心中却有彼此生活的想象”¹²。可见“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有其民族主义的背景，它同样适用于华校，许多学生可能没有见过彼此，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回忆，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为大群体的一份子。

文献综述中提到了两个概念：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微妙的差异，但经常交替使用，为便于讨论，本文将使用“集体记忆”涵盖两者。记忆有两

¹¹ Refer to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1995),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Cultural Studies, pp. 125-133; Astrid Erll & Ansgar Nünning ed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ara B. Young (2008)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Memory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Handbook*, Berlin, New York, pp. 109-118.

¹² Benedict R. OG.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16), 6-7.

个组成部分：第一，亲身体验；第二，想象自己参与其中。后者对本文的讨论也特别重要。

2.2 参考资料

笔者近年主持新加坡华校的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项目，对新加坡所有特选学校逐一进行调查分析，并由此进行个案研究。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涉及物质文化，包括校址、校舍和建筑特色；第二是非物质，包括校训、校歌、校徽、制服等等。希望通过这些材料的搜集和分析勾勒特选中学在新加坡的发展脉络和特色。¹³所搜集的材料包括与新加坡华校史有关的书籍、报章、杂志、校刊、特刊，以及本人进行的调查问卷与专访。校刊所撰写的校史对于了解各校发展过程非常重要，幸而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东南亚馆藏有许多华校旧校刊，虽然不是历年历届都有，但已足够呈现各校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图书馆还藏有各校历年的文学刊物和各种特刊，算是资料的一大来源。有趣的是，这些刊物有一大部分是工商补习学校转为政府小学前转赠与国大。

国大中文图书馆只收藏了圣公会中学创校至 1980 年代的校刊，在此之后的材料只能依赖口述历史和一些纪念特刊。（前）校长、（前）教师和校友们的口述历史访问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特选中学的了解，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大多不见别处。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尤为注重这些口述历史材料，以辅助文字材料的不足。除了进行口述历史访问，笔者还听取了国家档案馆的口述历史访谈，其中有些访问在官网上便可听取，但有些则需要到档案馆才能调出使用。

2.3 受访人士

由于二手材料无法完整说明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本文向四位校友进行口述历史访问以更好地了解校友们在校的学习情况。四位校友符合以下标准：

- 1) 在圣公会中学完成了四年的中学教育；
- 2) 就读圣公会中学期间活跃于课外活动；
- 3) 对在圣公会中学的日子有清晰的记忆；
- 4) 1970 至 1980 年代或 1990 至 2000 年代就读圣公会中学；
- 5) 曾在或正在圣公会中学任职。

四位校友的具体背景资料请见下表：

姓名	背景	毕业年份	课外活动	备注
傅同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校友在籍教师（数学）校友会成员	1984	男童军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圣公会中学 55 周年校庆委员会委员校史编辑
李同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校友离职教师（中文、中华文学）校友会成员	1984	口琴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圣公会中学 55 周年校庆委员会委员校史编辑

¹³ Heritage Research Grant from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in Singapore entitled by “heritage values of Chinese schools as cultural spaces” (92.90), 2017-2019.

曹同学	• 校友	2002	中文戏剧学会、科技社	• 《飞鹰》总编辑 • 中文戏剧学会舞台监督
王同学 ¹⁴	• 校友	2002	铜乐队	• 铜乐队长号队长

傅同学和李同学的口述历史访谈特别珍贵，对本文的论述有相当的帮助，因为傅同学和李同学两人均为圣公会中学校友，两人大学毕业后也回到母校执教。他们在求学时期活跃于校内活动，回校执教时参与了校史的编写。两位同学不仅提供了他们1980年代求学时期的材料，也叙述了1990年代及以后在圣公会中学所发生的事件，他们还在访谈中分享了编辑校史时所发现的一些材料及有趣的事情。傅同学是男童军旅的负责老师，他求学时期也是男童军旅成员。曹同学曾是中文戏剧学会和《飞鹰》的负责老师，《飞鹰》是圣公会中学的一本学生作品集。曹同学和王同学提供了1999年以后的珍贵材料，他们两人也是活跃的学生领袖，在学生时代积极参与学校的各大庆典活动。

3. 筹款活动与学校认同的建构

作为学生，在中学时代必定参与过许多校内外的活动，这些会构成对学校的回忆。但是并非所有的活动都让人难忘，比如一个热爱体育的学生会对运动会充满记忆，但是制服团体的学生或许就对运动会没什么印象了。因此，有必要通过受访者所记得的事件中，找寻共同点并通过现有的二手文献确定这些事件是否足以构成集体记忆。本文在整理了受访者所提供的讯息后，发现贯穿的主题是圣中每年举办的筹款活动。这种筹款活动以时间为序可分为三个阶段：1）创校至1970年代的建设体育馆的筹款活动；2）1980至1990年代的义卖会与文娱表演；3）新世纪至今的慈善益走与嘉年华的结合。

3.1 创校至1970年代：建设 Lee Kuo Chuan Stadium 的筹款活动

创校至1960年代是学校归属感的自然形成时期。被问及圣中有哪些具有建筑特色或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时，傅同学和李同学皆认为邵氏礼堂前的唐绍仪钟楼是校园和校友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校园中最高的建筑，学校的出版物当然对此大写特写。¹⁵其实，傅同学和李同学指出圣中的建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傅同学表示：

“其实圣中没有任何具有美术特色的建筑，其独特之处在于本校的建筑都是通过捐助在不同时期建成的。每年举办的募款义卖会便是为此筹款。”李同学同意傅同学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这就是‘圣中精神’，学生为未来学生的利益付出。”他们的看法说明建设校园与学校的身份认同有直接的关系。以下重点探讨 Lee Kuo Chuan Stadium 的建设过程。

圣中是新加坡第一所设有室内体育馆的中学。有趣的是，校方建体育馆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有个在室内运动的场所，而是由于收生人数逐渐增加，原有的设备已明显不够使用。特别是在雨天，下午班同学的嘈杂声常影响到正在上课的同学们。同样的，下午班早来的同学会影响到正在上课的同学们。有鉴于此，校长决心要筹建体

¹⁴ 按：本文为保护隐私起见，访问者的姓名仅注出姓氏，不出全名。

¹⁵ 圣公会中学编，《圣公会中学廿五周年纪念特刊》（新加坡：圣公会中学，1981），页 A32。

育馆，使同学们有一个活动场所。这项工程开始于 1963 年，由于经费问题，前后分三个阶段进行扩建。¹⁶ 圣中的 25 周年纪念特刊便如此记载：

1964 年收生剧增，校方开办下午班。而下午班的同学聚在一起的吵闹声影响了早班的同学，更何况当时没有图书馆或阅读室让学生等候。有鉴于此，董事决定盖一个八万元的室内体育馆。¹⁷

可见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促使校方必须开下午班，但由于早到的下午班学生没有地方休息而必须在教室外等候，打扰了还在上课的上午班同学，校方因此决定建一个体育馆让学生休息。

圣中创校 25 周乃特刊记载建设体育馆的想法在 1963 年便提出，而为了筹集款项，校方每年举办义卖会募款。¹⁸ 体育馆由李氏基金捐助三万元，故以李光前之父命名。可见历年举办的义卖会（尤其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主要是为了扩建校舍而举办。这点在 1976 年校刊的一篇文章〈本校李国专体育馆开幕典礼〉有所记录。¹⁹ 另外，一位念高二 A 的李光德同学就曾撰文记录 1960 年义卖会的情况，该文收录于同年的特刊。当时新加坡还未实施初级学院制度（junior college），因此圣中分为初中部和高中部。李光德的文章如下：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为本校义卖会的佳日由建校筹款委员会举办。创办本校的缘起及主旨，前会吏长吴德士先生曾于本校义卖会纪念册的发刊上略述道：“.....我辈不论信教或不信教者，均深觉在我们大城市中之市民，有二大主要语言及文化源流存在，一即是英国之传统，其次华人之传统。.....圣公会中学为中华圣公会唯一所创办之华校，预备以基督教之华文教育，使伟大之中国传统精神大放异彩.....”那天全校总动员，包括师长，董事及同学们都高兴彩烈地参加这盛况空前之义卖会，地点是维多利亚纪念堂。²⁰

正如前文所说，被问及圣中有哪些具有建筑特色或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时，傅同学和李同学皆认为圣中的建筑其实没有什么特色，但有一件事有必要分享：创校至 1960 年代，圣中的体育课会让学生在邵氏礼堂前的斜坡种草以稳定斜坡。因为圣中当时资源有限，这个活动进行了几年，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室内体育馆。

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的结合：一是学生在斜坡上种草，一是为体育馆的建设筹款。前者是为学校的建设付出体力，后者是为建设筹集善款。李光德的文章说明了义卖会使师生们欢聚一堂，很值得纪念。同样的，学生在体育课上以体力建设校园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Agnes Heller 的说法，义卖会和体育课都是定时举行的活动，重复进行便成为了文化记忆。另外，根据 Jan Assmann 的说法，体育课程与

¹⁶ 圣公会中学编，《圣公会中学年刊》（新加坡：圣公会中学，1976），页 14。

¹⁷ 圣公会中学编，《圣公会中学廿五周年纪念特刊》，页 25。

¹⁸ 同上，页 132。

¹⁹ 同上，页 131。

²⁰ 圣公会中学编，《圣公会中学建校特刊》（新加坡：圣公会中学，1960），页 12。

筹款活动一样有助于形成对于学校的身份认同。虽然这个所谓的身份认同无法清楚界定，但可以理解为学生对于学校的归属感或者向心力。

这个部分分析了圣中 1955 年创校至 1970 年代的一些事件如何促进不同家庭背景和年纪的学生同心协力达成目标。这些活动不仅成为参与者的集体记忆，也成为了这些事件的后人的集体记忆。这是有趣的一个情况，因为没有亲身参与的后人因为听到故事而觉得有参与感，增强与学长姐的共同记忆，将大家视为一个共同体。

3.2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义卖会与文娱表演

1970 年代开始，圣中的收生人数逐年增加，校舍需要扩建。因此，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仍持续举行募款活动。由于这段时期缺乏文献资料，所以口述历史访问所提供的讯息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时期几乎每年举办两场活动，一场是筹款的义卖会，另一场是结合圣中各文艺团体的文娱表演。

如今，义卖会在圣中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活动，但这个时期的义卖会更多的是在校内举行，规模比较小，不像之前李同学所形容的那些义卖会那么规模宏大。傅同学和李同学回忆起义卖会是圣中年度最大的活动之一。傅同学说道：

一些义卖会就在邵氏礼堂举行，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旧礼堂。出席学校义卖会的人一般是家长、同学。圣中的义卖会也得到大众的支持，许多校外人士都前来支持，其中就有学生家长的朋友还有教会的教友。

李同学回忆道：

每次举办义卖会我们都很兴奋，全班同学一起帮忙，有时候在学校待到很晚。这段时间真是令人难忘，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很好，很有团体精神。我们这么多年后还会约着一起出国，我们在车上不是听导游聊天，而是唱圣歌，那些我们在周会上一一起唱的圣歌。

通过傅同学和李同学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们 1981 年至 1984 年在校期间所举办的募款活动相当受大众欢迎，而学生们也积极筹备。就如之前所述，能将人们聚在一起构成集体记忆的活动可以建构学校身份认同。李同学的话透露了有趣的一点：“我们这么多年后还会约着一起出国，我们在车上不是听导游聊天，而是唱圣歌。”她还补充这些圣歌都是周会上牧师教学生的。可见，这些不断重复发生的事件形塑了集体记忆，而且这些记忆不是僵死的，它们在同学们多年后聚会上又得到了重复，加强了中学时的记忆。换言之，集体记忆是流动多元的，具有延展性（Malleability）。

这种筹款活动一直延续至 1990 年代，当王同学被问及她曾参加什么筹款活动时，她说：

我念书的时候每年至少有一场筹款活动，尤其那时刚好是校园重建时期，几乎一半的校舍要拆除重建。那是一段值得纪念的时期，我们举办游戏或者义卖来筹款。

每个人都出一分力。我中二的时候卖了麻薯，很受欢迎。虽然准备过程繁琐耗时，但我和朋友们都非常乐意为学校付出。

除了义卖会，文娱表演也是圣中筹款的重要方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娱表演并非校方提出，而是由学生自动自发联系各个校内文娱团体联合举办。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口琴团、合唱团和铜乐队。李同学念书时期（1981-1984）就是口琴团成员，她记得以前曾在参与校内的文娱表演：

那场表演在室内体育馆，所有的文艺团体彩排了很多个月。当时口琴团是个相当受欢迎的课外活动，我就跟大家一起上台合奏，还有一个环节是我的个人表演。那场演出后来录制成卡带，我还留着（但应该不能播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不会在意参加这些活动有没有什么课外活动分数，我们都是因为爱校所以愿意付出。

我们看到学生因为爱校而乐于参与这些自发的表演活动。这引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些活动将学生聚在一起而构成学校的身份认同，又或是因为爱校使学生主动参与学校里的活动？但最有可能的是对于学校的爱和校内活动相辅相成，共同成为身份认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义卖会和慈善表演活动让学生们团结一致构成集体回忆。从 Agnes Heller 的角度看来，文化记忆由这些重复举行的义卖会和慈善演出构成。如第一个时期类似，慈善表演与筹款活动一样有助于形成对于学校的身份认同，都加强了学生对于学校的归属感或者向心力。

进入 1990 年代，圣中仍然有各种持续不断的社团演出。当王同学被问及在圣公会中学参加了什么表演时，她谈及在铜乐队时每年都会参加音乐演出时的情形：

我念书的时候铜乐队每年都举办一场校内演出，每隔一年公开演出。我还记得其中一场在莱佛士酒店的表演厅，另一场在维多利亚音乐厅。门票公开发售，亲戚朋友和同学都来支持，感觉真的很好。其实，我念书的时候很多团体都有演出，有合唱团、中文戏剧学会还有口琴团，我们都会互相支持，真是令人难忘。

当王同学被问及如何筹备表演时，他说道：

我们铜乐队一般一周练习一次，但接近公开演出时，我们一周会联系三到五次。这意味着除了上课，我在学校都是跟铜乐队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关系特别好。

可见，这些文娱表演可以把平时各忙各的个别聚合在一起，时常见面，增进友情。因为，义卖会和文娱表演虽然只是一次性的活动，但背后的筹备时间很长，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和时间在一起，形成集体记忆。王同学点出各种社团活动“都会互相支持，真是令人难忘”，表演者有表演者的集体记忆，而观众也有看表演的集体记忆，这两个

集体记忆在表演当天重叠。就算没有参与表演的人也可以与表演者发生集体记忆。Benedict Anderson 说，阅读文学和接受讯息可以让作者与读者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表演者与看表演的观众也成为想象的共同体。

以上我们分析了圣中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集体活动（义卖会与文娱表演），不同家庭背景和年龄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同心协力达成目标，形成集体记忆和对学校的认同。这些活动不仅成为参与者的集体记忆，也看到这些事件成为后人的集体记忆。这是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没有亲身参与的学弟学妹因为听到这样的故事而觉得有参与感，增强与学长姐的共同记忆，成为想象共同体中的一员。

3.3 新世纪以来：慈善益走与嘉年华的结合

千禧年后，圣中除了常年保持筹款活动，也在形式和规模上做出改变。形式上，慈善音乐会值得称道，有代表性的活动如：铜乐队在 2008 年就在圣中大礼堂举办 L'amore Di Musica 慈善演奏会；合唱团 2009 年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了名为的 Quispian Novus 慈善音乐会。²¹

与此同时，校方热衷于大型活动的组织，筹款活动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新意层出不穷。圣中自 2013 年开始每年举办 iLoveAHS 慈善益走为学校筹措经费。2013 年的校讯记录了当年圣中嘉年华的活动情况：

圣中嘉年华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举行由学校管理委员会主席陈穗谦主持揭幕。嘉年华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学生通过他们设立的摊位展示他们的创意和生意头脑。这次的活动还有圣公会其他教会、家长会、校友和食堂摊贩的参与，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就没有这么嘉年华上的美食。游戏摊位由各个课外活动设立，每个课外活动都各显身手吸引客人。当日的焦点是铜乐队设立的鬼屋。那里还举办了一个跳蚤市场让学生和校友试试生意才华。我们向 1979 年毕业班的校友表示感谢，他们租下了两个摊位，并慷慨地将所有收益捐赠给学校！这次的活动展现了圣中上下齐心协力还有圣中精神。我们筹得了 22,000 新币，超越去年筹得的款项！我们期待明年的筹款活动能超越今年。²²

在 2016 年圣中嘉年华活动中，以三万个吸管爱心组合而成的画面进入新加坡记录大全，成为一时新闻。²³

2018 年圣中更是举办圣中家庭嘉年华，这是 iLoveAHS 慈善益走和圣中嘉年华结合而成的全新活动。校长辜泽鸿（Khoo Tse Horng）对于圣中家庭嘉年华的想法如下：

这是我们一家人（学生、教职员、管委会、家长和校友）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练早操，一起益走以及参与嘉年华会。我们要通过这个活动使大家团结一致，加强圣中精神。校友是我们圣中大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你们的贡献在于帮助建

²¹ “Fund-raising Concerts,” *Anglican High School Newsletter* 46 (June 2008): 6.

²² “AHS Carnival,” *Anglican High School Newsletter* 51 (July 2013): 3.

²³ 2018 年 8 月 15 日检自 <http://singaporerecords.com/largest-mosaic-made-of-straw-hearts-3/>.

立学校认同与自豪感。你们的求学经历与故事帮助学弟学妹们认识学校的特质并将之传承。希望大家能够常回校看看，多与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我有幸跟一些校友聊天，他们对于母校的关爱和自豪感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聊起求学的日子兴致激昂，眼神散发着热情！²⁴

两段引言可以看出圣中嘉年华和圣中家庭嘉年华的核心仍然是义卖会，其他的活动更多是为了造势或者是主题活动的点缀。这些活动可以让师生上下一心，校方或许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把这些活动搞得规模越来越大，加强学生的集体记忆和对学校的归属和认同。辜泽鸿校长认为校友的“求学经历与故事帮助学弟学妹们认识学校的特质并将之传承”，说明校方看到集体记忆的建构与维系圣中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联。

4. 结论与反思

图二：圣中身份认同的构成

以上笔者扼要叙述了圣中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的筹款活动，从中可以看出常年的筹款活动是让圣中师生校友上下一心的典范性活动²⁵，从而自然形成对圣中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和归属需要在重复与坚持中形塑与传承，成为一种集体的文化记忆留存于一代代圣中人心目中。回到 Jan Assmann 的说法，身份认同由实体部分、符号和

²⁴ 参见辜泽鸿校长在 2018 年的访谈，刊载于官方脸书粉转：

<https://www.facebook.com/anglicanhighalumni/posts/happening-now:-ahs-family-fiesta/1861730230536105/>

²⁵ 按：需要说明，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被采访者也有提及一些其他活动或趣事，如每隔一周举行的崇拜周会、每日练习的早操、钟楼的鬼故事、在圣中服务了 55 年的 Hassan 校工、旧校舍的厕所，等等。这些虽然难忘但本文并未涉及，因为一来不是所有校友对这些有印象，二来校刊内也没有清楚地记录，笔者以为这些不足义典范性地构成学校认同中的集体记忆。

活动组成。把这个理论运用在圣中上（如图二），实体可以是校园（或举办学校活动地点）；活动是所有人参与的各种筹款活动；符号是人们（学生、校长、教师、管委会、家长和校友）对于学校的爱。这三个部分相互重叠、彼此相关而非独立存在，共同构成对圣中集体记忆，每个个体以自己的回忆方式，确认他们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分子，从而实现对圣中的身份认同。学校在创校初期确实需要学生协助筹款，早期的筹款活动也说明华人相比于其他族群，对于慈善筹款有着天然的亲近与特别的青睐，他们重视子女教育，尊重传统价值，愿意为此付出。1980 年以后，校方举办更多更大型的筹款活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其实用性的经济价值，更是有意识地巩固和加强新一代学子对学校的认同感与凝聚力，并将之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即“圣中精神”）传承与发扬。在调查、采访和写作过程中，笔者每每为许多场景的描述和细节的追述感动。推而广之，圣公的这种筹款活动在 SAP 学校中具有代表性与普适性，可以综合对比考察。需要强调，当碰触这一课题时，官方的文献记录与个人的采访口述，大事件与小细节，理性与情感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最后，谈一点反思。众所周知，新加坡如今的华文教育处境艰难，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我们在称赞圣中各种筹款活动的同时，也不禁有所忧虑与反思，而这种忧虑与反思多少有些苦涩。何为“圣中精神”？圣中精神的文化价值究竟在什么地方？晚近以来，圣中的筹款活动是否加强了圣中精神及其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以圣中为代表的 SAP 学校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华校，到底还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学生亲近华文华语和华族文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着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的使命？毋庸置疑，SAP 学校仍然是多数人眼中的“好”学校，可是其华校背景正在逐渐消解，当我们欣喜和赞叹于这类筹款活动被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忧思于其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消失与淡忘。尤其对于新一代年轻领袖与年轻学子来说，筹款活动是否形式大于内容？当筹款更多地作为一种经济运作的手段时，到底还能在多大意义上加强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或者说筹款活动加强了捐款者对于学校的认同，但这是否代表着他们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这些问题当然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考量，非简单的是与非可以判断，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醒与反思。